

从“经济人”到“知识人”：解读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

张军 朱方明 陈健生

摘要：回顾经济学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构建出符合当前社会实践需要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提高人类经济行为的自觉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以及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自由人”假设，是划分经济学研究范式历史变迁的标志，贯穿这三大人性假设的主线是“自由”原则，而经济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实质则是对不同“主体自由”的扬弃过程。我们应当以“知识人”假设，作为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人性基础。

关键词：人性假设 经济人 管理人 自由人 知识人

自从亚当·斯密正式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有关经济学研究范式基本硬核的争论就从未休止。一般而言，不同经济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兴起，往往是特定社会经济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和反映，其生命力也必将伴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演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全面回顾经济学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揭示出不同人性假设与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实践背景间的关系，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实践需要提出新的人性假设，构建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提高人类经济行为的自觉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变迁与马克思的批判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严格意义上讲，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已有不少西方学者本着理性主义原则对人性的一般规定展开过前期研究工作，而亚当·斯密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人性的本质进行了创造性归纳和完善，并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出版为标志，正式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经典硬核——“经济人”假设。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基本行为特征作了详尽描述。他认为，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本原因，“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这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基本心理动机就成为一切经济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动力。

亚当·斯密以个人自利原则为基石，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必须自由放任地让市场机制去自动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建立“一切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而要实现均衡生产，就必须实行经济自由。斯密认

为，“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

在解释个人自利行为推动社会公益目标实现的内在机制时，亚当·斯密创造性的引入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他说：“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在肯定自利心对“富国裕民”目标的实现能够发挥更有效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将自利心与利他心截然对立起来，而是把自利心视为实现利他心的更有效手段和方式，利他心则是自利心的最终归宿和价值取向。斯密曾说：“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推广诚实和遵守时间的道德乃是商业”，“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此外，斯密也没有将“经济人”假设当作完美无缺、囊括无遗的绝对真理。他认为，对于那些沉醉于奢侈消费的少数人来讲，道德目标和自利目标的调和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多数人都成为财富和显贵的钦佩者和崇拜者”，从而会使人们的道德情操败坏，对此，斯密善意地提醒人们：“如何补救这些缺点，是值得认真注意的事。”

就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而言，斯密时代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不过，工场手工业仍然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但手工技术向机器大生产过渡的端倪已日益显现。由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处于迅速上升期，资产者与劳动者间的斗争尚属于初级阶段，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间的斗争也不像产业革命后来得那样尖锐。这就给世人造成了一种真实的“错觉”：似乎在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行为动机

是相似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通过自由竞争,完全可以达到“自然均衡”和实现“自然理性”。斯密也正是在这种真实“错觉”的基础上抽象出了以自利心为最佳行为动机和一般人性特征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该体系的实质可以理解为用“生产自由”来取代“权力自由”,通过反对政府的“妄为”和“管制”,反对经济垄断和行会约束,来塑造一个合乎人性的、合乎自然的,因而也是“永恒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用历史眼光看,斯密“经济人”假设的确是对当时社会时代背景的有效反映,是当时社会经济实践在思维层面的凝结和升华,历史的逻辑和方法的逻辑在这里实现了有机结合。但这也正恰恰表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所蕴涵的人性特征是且只能是一种历史特征,它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永恒价值是且只能是它的历史价值。

(二)后斯密时代“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入19世纪后,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基本工业部门中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已占据明显优势,这标志着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顺利完成。这次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且也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首次成为全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迫使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这就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以此为基本硬核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西方经济学界也从此开启了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持续修正史,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马歇尔、凯恩斯、莱宾斯坦和西蒙。

1. 马歇尔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在探讨经济学研究对象时,马歇尔尤其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学应该着重考察人的心理和动机。针对后斯密学者将自利心作为唯一行为动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所遭遇到的理论与现实挑战,马歇尔采取了模糊主义态度。一方面,他承认以利己心为基本硬核来构建经济学体系是不成功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另一方面,马歇尔也坚决否认利他心是推动社会经济运行的唯一动力和最佳选择,他认为“一般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连长时间地实行纯粹的和理想的利他主义;只有当少数笃信宗教的人的有力的热忱,使得物质上的关心与崇高的信仰相比变为无足轻重时,才有例外”,“但是,在负责地处理事务时,忽视依然附于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属愚蠢之至。”

为了解决“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马歇尔对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定义进行了彻底修正,他说:“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血肉之躯的人。”同时,为了回避在界定一般人性特征时可能面临的麻烦,马歇尔特意在概念上

进行了转换。他把功利主义中的“快乐”和“痛苦”换成“满足”和“牺牲”,认为这是支配人类经济生活的两种根本动机,其中,“追求”满足“促进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而避免”牺牲“则制约着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马歇尔还认为,人类的动机并不像过去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可以直接度量,只有货币才可以作为衡量满足和牺牲的标准。这样,马歇尔通过概念的有效转换,成功地回避了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一般人性特征进行界定的使命,以及由此可能遭遇的“痛苦”。

对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自由竞争理念,马歇尔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说:“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不过,此时的马歇尔对自由竞争原则在总体上仍然抱颂扬的态度。后期的马歇尔面对英国工业的没落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则完全改变了自己关于自由竞争的观点,主张英国建立垄断联合,以便克服英国工业技术的落后性和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至此,他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已达到了顶点。

2. 凯恩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到了20世纪初,西方主要工业国已陆续进入垄断经济发展阶段,其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致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并危及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然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却无法有效地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界被迫从理论上寻找新的出路,开始了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的全面修正和补充。这些探索改变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面貌,并从此进入了“凯恩斯时代”。

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彻底地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关“市场均衡”的理论前提,他说:“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⑩由于市场经济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对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不啻于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亚当·斯密有关自由竞争和国家管制等方面的理论,而且对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也作了大量修正。

凯恩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将个人的行为动机分类进行了系统归纳。在深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心理因素时,凯恩斯将其背后隐含的行为动机划分为四种,即“所得动机”、“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在这些动机中,凯恩斯尤其强调利得动机,他认为:“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敛。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有利得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⑪。针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收益最大化”行为原则,凯恩斯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他说:“设今日之决策可以影响未来,则此种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事实上也没有方法作此种计算”,“理智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尽力设法挑选,在可以计算之处,也计算一下;但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象、情绪或机缘。”^⑩鉴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彼此间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存有很大差异,凯恩斯彻底放弃了亚当·斯密基于“理性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理论观点,转而提出了“管理人性”^⑪的概念。这也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3. 莱宾斯坦和西蒙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工业化社会陆续出现了“经济滞胀”现象,人们开始对过去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以寻找刺激社会经济增长和降低通货膨胀的动力与源泉。1966年,美国哈佛教授哈维·莱宾斯坦首次提出了“X效率理论”。在分析个人行为动机时,莱宾斯坦认为个人的行为受到从表面来看相互矛盾的两种人格倾向影响,一种是在决策时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超我功能”;另一种倾向是本能地不愿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计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是一系列连续变量。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而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是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就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可以说“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⑫。

在界定人性的一般特征时,莱宾斯坦认为人的本性是“惰性”,这种惰性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显示不出来,因此“人们理性程度与他承受的压力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⑬。随后,赫伯特·西蒙也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广义而言,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它(a)适合实现指定的目标,(b)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经济学家一般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是表示抉择过程的属性”^⑭。在西蒙看来,“理性经济人”假设中所含的“完全理性”是不现实的,相反,“有限的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追求令人满意的利润也比追求最大利润更接近于现实,由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寻找满意的人”的假说^⑮。

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来比较,亚当·斯密本源涵义的“经济人”假设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比,二者可谓迥然各异。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关键点在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经济运行主体彼此间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必然会促使各经济运行主体在行为动机、行为方式、行为目的和行为效果等方面出现根本性差异,这就彻底改变了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存在的客观基础,从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对对其进行持续修正的现实需要。

虽然,斯密“经济人”假设早已失去了作为人类普遍行为特征的现实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毫无价值,至少对于“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而言,在竞争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冲动的共同驱使下,他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毫无止境的,而这就符合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内在要求。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无论对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进行怎样的“修正和补充”,都没有彻底否定自利心的驱动作用。但对于劳动者而言,由于资产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建立在劳动者利益最大化受损的基础上,而后者既无能力更无条件与前者展开“自由竞争”,这就使得强调“自由竞争”、“利己而不损人”的斯密“经济人”假设对于劳动者而言,缺乏实际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其说西方经济学家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和补充”,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理性判断”能力,推动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还不如说是为了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对劳动者进行有效的“人性管理”,以保证资产者利益的更好实现。这一点无论是对马歇尔、凯恩斯,还是莱宾斯坦、西蒙而言,都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后斯密时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不管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多大区别,其实质都可以理解为用“资本自由”来取代“生产自由”。

由于亚当·斯密本源涵义的“经济人”假设与不断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在内涵上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与其在形式上继续沿用“经济人”假设的概念,还不如从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的根本目的出发,将后斯密时期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硬核统一界定为“管理人性”假设。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已经开了先河^⑯。

(三) 马克思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及“自由人”假设的形成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伴随着机器大工业而来的劳动者和资产者间的对立与斗争也日益明显和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出现。以斯密“经济人”假设为基本硬核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和解决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时,遭遇到了严峻挑战。与其他西方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对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采取了彻底扬弃的态度,并在扬弃过程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一般人性观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

马克思首先对指导亚当·斯密形成“经济人”假设的“理性主义”方法论进行了批判,他说:“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⑰马克思认为,理性方法在现实客观经济活动的支配下,绝不是一个永恒至上、完备无缺的认识工具,现实经济活动中必然会发生新现象与旧范畴之间的矛盾,只有理性范畴的发展能适应于业已改变的情况,才使科学的理性认识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观察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前提不应是理性泛化了的“抽象的人”,而应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现实的人”,“经济人”假设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⑱。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曾对马歇尔经济学产生过重要影响^⑲。

针对“经济人”假设中强调的自利心,马克思认为,这是个人自身发展还存在着“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

出来的个人行为特征。他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个人自我实现会经历三大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3}。由此,马克思指出:“人则既不善,也不恶,就只是有人性”^{②4},人的本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规定了经济活动中人的本性与本质,而不是相反——将人性视为一个先验的存在和永恒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性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耦合性。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5},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②6}。

关于人的行为动机,马克思则始终坚持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7}视为探讨人的本质、一般人性特征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的指导原则。马克思指出,虽然“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②8},但“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②9},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仍然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同时,马克思也认为,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是可以统一的,正如他所说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③0}。

全面总结马克思的人性观和个人行为动机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谓人的本质,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人的本性,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反映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它可以具体化为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心理属性,也可以抽象为“人的需要”;所谓人的特性,是指“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个人行为的动机,是为了实现对“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超越,从而实现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也可以简化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个人行为的方式,一般必须要借助于群体力量,借助于整个人类积累下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财富,来满足个人行为的目的。简言之,就是要用“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些结论均可视为马克思“自由人”假说的主体内容。

客观地讲,马克思的“自由人”假说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以及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假说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前后扬弃的逻辑关系。如果说,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说的实质体现了“生产自由”对“权力自由”的扬弃,而后斯密时代“管理人”假说的实质体现了“资本自由”对“生产自由”的扬弃,那么,马克思“自由人”假说的实质则充分体现了以“个人自由”对“资本自由”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在现实社会中又是以“劳动自由”对“资

本自由”的扬弃作为前提和条件。形成以上扬弃关系的物质基础是统一的,那就是社会化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并由此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在社会化大分工初期,“市民社会”刚有雏形,此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就是要彻底摆脱原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思想以及宗教理念等对其产生的束缚和压制,斯密“经济人”假说的提出以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正是这一历史使命的产物。伴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向纵深发展,机器大工业应运而生,“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的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它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③1}。

面对如此“可怕”的力量和严峻挑战,经济学家逐渐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坚持认为,私有制是保障个人自由和社会效率的最有效的手段,社会生产力发展之所以受阻,不是私有制本身有不足,而是由于人性的差异和缺陷,因此,只要对人性进行“有效管理”,自然会克服经济发展中的障碍。这种思想就直接产生了对斯密“经济人”假说进行持续修正的必要。然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无论是私有制,还是“经济人”假说,都只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但又不够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只是实现个人完全自由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的一些重要手段,手段的出现和消亡完全是为了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服务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为实现人的各种需要服务的特定的行为手段。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就出现了马克思的“自由人”假说。

二、当代西方人性假设的发展及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

(一)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人性假设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对一般人性特征和个人行为动机的研究过程中,西方管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也做出了大量努力。这些学术探索往往同个人的激励理论紧密相关,因为这些学者认为对组织中人性的不同假设,将直接影响到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管理绩效。美国组织行为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里格在其所著的《企业的人性方面》一书中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性假设,“一种基本上是消极的,称为X理论(theory X);另一种基本上是积极的,称为Y理论(theory Y)”。而X理论与“理性经济人”假说有着密切联系,可视对后者的理论概括。基于这种假设所引出的管理方式是,组织以经济报酬来使人们服从和做出功效,并以权力与控制体系来保护组织本身及引导员工。其管理的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完成任务,其管理特征是订立各种严格的工作规范,加强各种法规和管制。美国的“泰罗制”就是贯彻“经济人”假说的典型代表。

美国社会哲学家玛丽·派克·福莱特是最早承认应从个体和群体行为两个角度来看待组织的学者之一。福莱特认

为,组织应建立在团体道德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她指出,除非在群体交往中得以释放,否则,个人潜力依旧是个人潜力。原因在于“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⑧,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将会发现,只有在顾全团体利益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证。这即是“社会人”假设的主体内容。

该假设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是由社会需求而引起工作动机的,并且通过与同事的关系而获得认同感;工业革命与工作合理化的结果,使工作本身失去了意义,因此只能从工作上的社会关系去寻求意义;员工对同事们的社会影响力,要比管理者所给予的经济诱因及控制更为重要;员工的工作效率随着上司能满足他们社会需求的程度而改变。由此,该假设得出的管理方式与根据“经济人”的假设得出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它强调除了注意工作目标(或指标)的完成外,更应注意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们的需求;不应只注意指挥、监督等,而更应重视员工之间的关系,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应只注意对个人的奖励,还应提倡集体奖励制度。

“自我实现人”假设是伴随着亚伯拉罕·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提出而问世。所谓自我实现,指的是每个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个人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个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说,人们除了社会需求之外,还有一种想充分运用自己各种能力,发挥自身潜力的欲望。

“复杂人”假设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提出的人性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随着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每个人的需要都各不相同,需要的层次也因人而异;人在同一时间可能具有各种需要和动机,它们会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机模式;人在组织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会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由于人的需要不同,能力各异,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没有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时间、任何个人的统一的管理方式。在上述假设前提下,要求主管人员必须根据具体的个人的不同,灵活运用不同的管理措施,以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

根据对一般人性特征及个人行为动机认识的深化,西方管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还提出了相应的个人激励理论,诸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激励-保健理论、ERG理论、麦克莱兰的需要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论、公平理论以及期望理论等。

纵观西方学术界有关一般人性特征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资产者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政治和文化地位的变迁,他们关于人性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的探讨逐渐带有了“思辨色彩”,而展开科学研究的欲望却在逐步消退。不过,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人性学说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理论诞生之后,又有所改观,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西方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西方管理科学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学术

成就,而这些成就又往往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寻觅到理论渊源。相对于管理科学的理论创新,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却显得大为滞后,思辨色彩也愈加浓烈了。

当代西方管理科学在从事人性假设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同期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紧密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伴随着科学技术急速发展,新兴工业不断出现,技术更新速度空前加快。此时,无论是企业生产规模,还是空间活动区域,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扩大。由于科技的发展,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管理工作的细化,致使劳动者集群的人员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白领工人”的比重持续上升,而以纯粹体力性操作为主的“蓝领工人”的比重则不断下降,整个劳动者集群的人员素质普遍提高。同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实践,各国劳动者集群的组织程度和斗争实力大大加强,从而无论在获取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方面,还是切实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手段方面,都对完全由资产者所主导的利益分配模式和格局形成了巨大压力。

面对严峻的外部生存威胁,西方管理学家与组织行为学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尽可能地借鉴和吸纳马克思的人性观和个人动机理论,积极改进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有机协调劳资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极力缓和劳资间的矛盾,以便在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的同时,全力维护资产者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本质上看,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人性假设的实质仍然是保障“资本自由”。不过,它与后斯密时代“管理人”假设所强调的“资本自由”相比,也有一定的区别。严格意义上讲,“管理人”假设只承认和支持投资者的“实物资本(或财务资本)”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的自由,并将该“自由”的实现纯粹建立在劳动者收益最大化受损的基础上;而当代西方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在切实维护“实物资本(或财务资本)自由”的同时,对劳动者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以及该资本追求合理收益的“自由”,也作了必要的承认与妥协,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力争维护和实现两者间的“双赢”博弈格局。从这个角度看,当代西方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顺应了时代潮流,属于历史的进步。

当然西方管理科学在研究一般人性特征及个人行为动机时,依然人为地将组织中的个人明确界定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自觉自在人”与“他觉自在人”,这不能不算是令人遗憾的“思维定势”。

(二)以“知识人”假设为基本硬核,重构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还是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假设,其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正在接受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严峻挑战;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马克思“自由人”假设所强调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相比,也仍

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对人类行为特征进行抽象概括,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性假设以满足实践需要。一般来说,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人性特征深受该时期特有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制约,而“知识”作为现代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对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对人们的行为特征产生了特殊影响。这就为以“知识人”假设作为基本硬核,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创造了现实基础与客观条件。

所谓“知识”是指人类历史上对一切客观事物认识的结晶,是人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所得到的以逻辑形态反映客观世界的、以物化人造物为最终目的的理性认识的总和,是人类所有观念形态的文明的积极成果,其核心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管理科学、行为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而“知识经济”一词则源自当代对知识和科技在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中作用的再认识,它是指“以对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以科技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形态”^⑩。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人们总是认为生产规模取决于所用生产要素的数量,特别是劳动、资本、设备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额,其核心是资本积累。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铁的事实促使经济学家认识到,未来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将更直接地取决于知识与智力的投资。这样,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必须进行重新界定,以便将关注的焦点从实物资本积累转移到创造新知识和应用新技术上来。

一般而言,知识经济的特征主要有四点:其一,它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二,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有效的科研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其三,掌握先进技术和最新知识的高素质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四,富有挑战性的创新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和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个人的创新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国际间的一切竞争最终都归结为人才的竞争,归结为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竞争。所有这些都为以“劳动自由”来取代“资本自由”,进而推动“现实的人”最终向“自由的人”的飞跃创造了客观条件。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终身教育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也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中,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除了表现在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外,关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的生产资料将软化,或者说,生产资料将越来越多地由有形的物质形式转变为无形的非物质形式”,原有的物质资料本身也将被理解为“特定的科技成果”,而以劳动者“劳动能力”为基本内容的“人力资本”将从此成为生产资料中新的且至关重要的构成,并获得与“实物资本”相同的(最终将高于“实物资本”的)对经济运行的控制权;“其次,生产资料的软化将使传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再是完全的或充分有效的所有权,从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晰”,“在现实生活中,有关专利技术

与商业秘密等的保护法规的发展,明确表示了对有形物品的所有权远不能确保对这些无形资产有意义的所有权;这些法规不同于物的所有权的特点,则表明了明晰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困难”;“再次,生产资料的软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所有权难以确立,它还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这体现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不再意味着对生产过程不变的控制”,因为“一方面,由于所体现的科技成果的领先地位会随时变动,特定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也会有相应变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软化所导致的生产资料界限的模糊,更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生产过程的相关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将不再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具有过去那种核心地位”^⑪。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内容以及物质载体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中的变化已充分表明,建构在特定物质资料内涵和特定所有制形态基础上的“经济人”假设与“管理人”假设正面临着历史对其的扬弃。另外,由于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马克思“自由人”假设所要求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亟需用一种新的人性假设为基本硬核来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而“知识人”假设应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客观选择。

“知识人”假设是以马克思一般人性观为基础,结合知识经济时代个人行为的主要特征和人类价值理念的最新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实践,而抽象出来的用于集中反映当前时代特征的一般人性假设。它充分体现了“知识”对人类改造现实世界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深刻反映了“知识”对改变人类自身,促进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意义。它是马克思“自由人”假设基本内容与现实社会客观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在尚未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时,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将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物化源和价值源,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综合素质时所展示出的人性特征,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以“劳动自由”来取代“资本自由”。另外,当我们在科学地精炼“知识人”假设的应有内涵时,还需要充分借鉴和积极继承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假设,以及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人性假设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联系到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实际国情——即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低,结构性差异大,区域商品经济成熟度高度不均衡,行业垄断、地区封锁以及某些政府特权仍将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与运行机制形成严重障碍时,我们仍需将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强调的“自由竞争”意识和“利己而不损人”的行为观念、“管理人”假设所追求的“合理利润”的行为动机,以及当代西方管理科学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等,有机、系统、科学地融入“知识人”假设的本原涵义中去。

由此,我们可以抽象出“知识人”假设的主体内容,即: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中,随着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个人行为动机不再是纯粹单一的心理需要,“包括利他动机在内、对不同目标和奖赏有反应的扩充的自我概念,将取代仅仅受自利动机驱使的狭隘的自我概念”^⑫,这意味着个

人心理动机将呈现出结构性与层次性的多元化特点;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也将由狭义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向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的综合价值合理化转变;人们的行为目的不仅仅要考虑当前的实际需要,而且要充分考虑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在高度关注“人力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也要积极运用“创新知识”及“创新技能”,大力加强对“自然物”与“人造物”的改良和改进,以便使其能更有效地发挥服务功能;最后,人类在寻求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还应努力实现人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些都可视为“知识人”假设的主要内容。

以“知识人”假设作为基本硬核来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需要做好六方面的结合:第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相结合,核心是解决好公平与效率问题;第二,个人发展与社会公益相结合,重点是解决好自利与利他关系问题;第三,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相结合,主要是解决好资本与劳动的平等合作问题;第四,自由决策与社会调控相结合,关键是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定位问题;第五,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相结合,主要是解决好竞争与资源流动问题;第六,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结合,核心是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贯穿这六大结合的主线就是“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注释:

如: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是恶劣的(tristi)”,“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文版,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重商主义者约翰·黑尔斯则假定“个人受自身利益的驱动,每个人都寻求自己的最好的位置,对每个人最有利的事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利的”(见《英吉利王国公共福利对话集》);重农主义者杜尔阁坚持认为“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法官”,魁奈则认为只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才符合“自然秩序”,而“人为秩序”的确定应以“自然秩序”为准则(见《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文版,3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上卷,13~14、3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下卷,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文版,260、242、261、2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11~12、30、47、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①②③④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文版,7、322、139、3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⑤⑥刘东:《微观经济学新论》,68~71、7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⑦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中文版,3~4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⑧龚伟华:《“资本的人格化”与“经济人”假定》,载《经济学家》,2000(5)。

⑨新制度经济学派已用“社会——文化人”假设来取代“经济人”假设,并认为个人的行为动机具有多重性,而不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43页,北京,人民

出版社,1979。

⑫见前文马歇尔对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再界定。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⑮⑯⑰⑱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上),18、273、34、84、6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⑳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51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㉒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文版,5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㉓张军:《知识经济 美国模式 我方选择》,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1)。

㉔袁葵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学》,载《四川大学学报》,1993(2)。

㉕张雄:《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45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4、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960、1958、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7.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8.西耶斯:《论特权》,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0.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1.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中文版,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3.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4.刘东:《微观经济学新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张雄:《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16.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7.龚伟华:《资本的人格化”与“经济人”假定》,载《经济学家》,2000(5)。

18.袁葵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学》,载《四川大学学报》,1993(2)。

19.张军:《知识经济 美国模式 我方选择》,载《社会科学研究》,1999(1)。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0064
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 610000)
(责任编辑:Q)